

1990年代以来邻避运动研究现状述评

李佩菊

内容提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邻避运动进入高发期,世界范围内关于邻避运动问题的研究也渐次展开,邻避运动的成因、可能的后果以及解决之道是这些研讨的主要方向。本文援引近年来国内外主要研究文献,通过研究现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的梳理,试图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之间构架起一条富有建设性的通道。

关键词 邻避运动 欧海尔 社会治理 群体性事件

李佩菊,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213001

邻避设施是一种运行效益为多数市民所共享,但负面效应由周边居民来承担的设施,如垃圾焚烧厂、化工厂、殡葬设施等。2010年以来,一系列因邻避设施而引发的民众抗议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如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以及浙江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昆明PX事件等,均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为城市化开始较早,早已经历了邻避冲突的集中爆发期,学术界对此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977年,欧海尔(O'Hare)提出“邻避”(Not In My Backyard, 缩略语为NIMBY)概念^[1],之后这个概念被学术界广泛使用,邻避冲突成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频繁发生的邻避运动使得一些急需的公共设施建设受阻,产生了较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基于此,我们将邻避运动置于学术研讨框架之内,从国内外邻避运动研究的历史文献出发,梳理1990年代以来关涉这一现象的研究文献、研究方法以及价值倾向,希冀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之间构架起一条富有建设性的通道。

一、国内外邻避运动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邻避冲突的研究开始较晚,“邻避”的概念在2007年之后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邻避”为主题,限定社会科学领域检索到论文265篇,从数量上看,有关研究论文在2006年左右开始出现,2013年起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仅2013—2015年的研究论文就达到220篇,这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邻避事件中的政府舆论主导权研究”(14TQB001)阶段性成果。

[1]O'Hare M. Not in My Back, You Don't: Facility Sitting a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t of Compensation. Public Policy, 1977.25(4): 407-458.

显示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而以“Not-In-My-Back-Yard”或“NIMBY”作为关键词在SPRINGER和ELSEVIER数据库进行Abstract、Title、Keywords全网检索,限定社会科学领域共有417篇;根据Cambridge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 2011数据库检索到225篇,根据EBSCO数据库检索到154篇,均包括著作和论文,可见国外邻避研究规模领先于中国。

从研究内容上看,中西方关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邻避冲突的概念、成因、本质,邻避抗争行为强度的生成因素,邻避冲突的治理对策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还较多地探讨了中国式邻避事件的特点及解决路径。

1. 邻避运动的概念内涵

什么是邻避运动?目前关于这一概念内涵和界定的表述虽各有不同,但其含义大致接近,基本符合欧海尔“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的原始内涵。如寒竹从邻避一词的起源来谈邻避运动的概念与特征,指出“邻避运动”意指居民为了保护自身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社会反抗行为。从这个词的起源上看,“邻避运动”跟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只是强调的是保护地方民众的小环境,而不是人类或整个社会的大环境^[1]。邓君韬认为“邻避运动”就是项目所在地周边居民为反对具有实质或潜在环境威胁项目而自发的环境保护运动^[2]。王奎明、钟杨认为,在某一区域内所建立的设施为大部分居民带来利益,但是设施周边居民却承受设施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引发这部分居民的抗争行为即邻避运动^[3]。

可见,邻避运动因邻避设施而起,其关注点指向的是特定范围的社区环境污染问题。近几年发生的“邻避运动”,从发生到收场几乎都沿袭了同一模式:某地重大污染项目在绝大多数居民不知情状态下准备兴建,被曝后激起当地民众抗议,又通过网络等载体进一步发酵、扩大事态,使当地政府迫于民意最终取消被反对的项目^[4]。这类由邻避设施的选址、兴建以及运营所造成的民众抗拒心态与反对行动可以称为“邻避冲突”或“邻避运动”^[5]。

2. 邻避运动的生成因素

关于邻避运动的生成,西方研究文献更加注重已有经验在人们面对邻避问题时可能采取的行为的影响,经验在人们对于支持或反对建设一个风力农场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有人会依循错误的经验,有人会遵循正确的经验来达成行为^[6]。并且,如斯洛维奇所言,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认知能力与认知层次存在重大影响,具体到邻避运动中,则影响其对风险的感知能力^[7]。可以看出,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领域当中,这种认知能力与认知层次的差异和认知框架有关。

如果说西方学者展示了民众旧有观念框架对于行动的巨大干预能力,那么国内学者更多地探讨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抵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对邻避设施潜在风险的认知的影响^[8]。如《“中国式”邻避运动核心议题探析——基于民意视角》^[9]通过调查指出,年龄因素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弱正相关性,年龄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民众参与邻避抗争活动的意愿越弱;《中国式邻避运动影响因素探析》^[10]指出,经济补偿因素本身存在一个临界值,当经济补偿金达到足以让民众重新买房搬家时,民众

[1]寒竹:《邻避运动的起源与化解之道》,〔上海〕《社会观察》2014年第5期。

[2]邓君韬:《“邻避运动”视野下PX项目事件审视》,〔长沙〕《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3][9]王奎明、钟杨:《“中国式”邻避运动核心议题探析——基于民意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刘晓星:《“邻避运动”兴起 公众参与效应持续发酵》,〔北京〕《中国环境报》,2013.5.29。

[5]转引自陶鹏、童星:《怎样看待和处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南京日报》,2010-9-7。

[6]Kate Burningham, An Array of Deficits: Unpacking NIMBY Discourses in Wind Energy Developers'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ir Local Opponents,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p.252.

[7]Slovic, P. Perception Risk, Trust, and Democracy: A System of Perception. Risk Analysis, 1993, (13): 675-682.

[8][10]王奎明、于文广、谭新雨:《中国式邻避运动影响因素探析》,〔合肥〕《江淮论坛》2013年第3期。

支持度骤然提高;而当经济补偿金无法达到这一临界值时,民众态度基本徘徊在反对与强烈反对层面,并且普遍认为提供经济补偿金是企图用金钱换取他们的健康,特别是正在抚养小孩的年轻夫妇,反对情绪最为激烈。可见,国内学者研究的内容更多地是一种“在场”观念的反应。

此外,西方文献还将这种认知搁置在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之下,一场希腊的邻避运动足以表明社会信任是影响人群行为的重要因素。这种信任源自个体对环境对制度的长期以来的习惯性认知^[1]。公众逐渐增长的经济意识,城郊土地成本的增加,政治自由与域外法律意识的深入等因素都是影响甚至改变公众认知的重要因素^[2]。

3. 邻避运动对策探究

中西方学者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围绕着采取怎样的解决手段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如经济补偿手段,有学者指出邻避设施收益者应对周边居民提供经济补偿以鼓励接受设施设址^[3],但这一手段的有效性、合理性本身仍存在争议;也有学者从管理机制层面提出措施,如钱轶群指出应构建以前馈控制理论为指导的环境诱致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机制^[4],朱宏锋认为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以加强决策阶段的科学化程度^[5]等等。

虽然中西学者在邻避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抒己见,但在寻求治理路径和治理目标上,双方都强调意见表达、收集和分析是解决邻避运动的重要条件,推动公民参与、提升公民话语权是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德拉蒙德通过对爱尔兰旅行者的控制激发的运动行为,提出了尊重公民意愿、进行沟通等解决手段^[6]。这与张婧飞论及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时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提出对于农村群体而言,邻避问题的防治路径主要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等^[7]。

澳门学者在研究澳门邻避问题上,认为邻避抗议运动的兴起为从社区层面引入参与式治理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实验契机,提出了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强调采用参与式治理模式,这与澳门所具有的丰富社团组织与悠久自治传统有关,为邻避设施的选址决策提供了超越技术层面的制度选择^[8]。这与英国学者戴尔的研究思路较为相像。戴尔认为邻避冲突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并将它作为城市冲突的一种主要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9]。可见中西方研究者都注意到城市化进程与社区形成对邻避运动治理的作用。

对策的效用大小需要实践的经验,对策的形成更需要从实践中去摸索。在这方面较有成效的研究者有 Graham-Rowe^[10]、RS Burnaman^[11]、Thornton 和 Knox^[12]等西方学者。为了加强沟通管理,可以通过

[1]Iosif Botetzagias, The role of NIMBY in opposing the siting of wind farms: evidence from Gree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235.

[2]沈侃文、余岳华: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Spread of the NIMBY Syndrome against Waste Disposal Sites in Taiw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40(2), 1997:273-280.

[3]Groothuis a, Groothuis D, Whitehead C. Green vs. Green: Measuring the Compensation Required to Site Electrical Generation Windmills in a Viewshed. *Energy Policy*, 2008, (4).

[4]钱轶群:《环境诱致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2(3)。

[5]朱宏锋:《公共设施的邻避冲突及对策—以里畈水库为例》,〔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4.

[6]Not in my back yard: control of Irish Travellers by paramilitaries and vigilantes across the island of Ireland, *Contemporary Justice Review Issues in Criminal Social & Restorative Justice*, 2014, 17(2):216-232.

[7]张婧飞:《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8]娄胜华、姜姗姗:《“邻避运动”在澳门的兴起及其治理》,〔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4期。

[9]Dear, M., S.M. Taylor, Not on Our Street: Community Attitudes Toward Mental Health Care. London: Pion, 1982:65-68.

[10][36]Graham-Rowe, Not in my back yard! AR app for planning, *New Scientist*, 2011, 210(2806):23.

[11][37]RS Burnaman, A Discussion: NIMBYism (Not-in-My-Back-Yard), *Florida Bar Journal*, 2004.

[12]Thornton & Knox, Not in My Back Yard: The Situa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terminants of Opposi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2(12):2554-2574.

设置三维数字模型等应用程序,促进居民与政府的沟通^[1];邻避问题的核心在于怎样建立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模型,这种模型的建立能够化解传统交流方式的不足^[2]。国内学者如何艳玲、陈晓运等人,认为邻避设施兴建方提出的“技术安全”、“依法行政”和“民心工程”的“不怕”叙事方式并不能有效地规训业主的认知,业主出于“我怕”的认知框架,形成不同程度的抗争动机,在解决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业主主体性,开放公民参与,在认知层面建设“不怕”话语体系的配套系统-信任机制^[3]。

正如美国学者沃克所言:“在众多的关于邻避运动项目许可证或者选址问题上的争论,仅仅提倡公众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只能说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已,即便是从专家或咨询机构那里得来的意见依然是有失偏颇的。真正解决这种问题,必须要自下而上的搜集所有的意见,包括民众的态度、倾向、建议、反对理由等等,这些都是捉摸不定的东西,但至少经过这个程序之后,所有的意见表达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最起码能够给邻避运动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参考。”^[4]

二、邻避运动研究之视角、方法及特点

虽然中西方学者面临的邻避问题的语境多有不同,但其关注的话题、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有许多共通之处。

1. 多学科视角切入邻避运动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视角丰富多元,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从多个角度来研究邻避运动。

如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南京大学李德营通过对邻避运动的跟踪考察指出:邻避运动对于城市地区环境矛盾的解决容易推动邻避设施向乡村地区转移,进而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矛盾。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解决当前中国环境矛盾的举措^[5]。而赵小燕的文章引入了三种人性假设视角,认为公众参与邻避冲突的动机非常复杂,“经济人”、“社会人”和“政治人”这几种动机是邻避冲突中凸显的三种人性动机,是激发居民参与冲突的重要推动力,只有居民的“经济人”、“社会人”和“政治人”的人性诉求得到合理的回应才能有效地化解邻避冲突。而利益补偿机制、决策参与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及社区化解冲突机制将有效地回应公众的人性诉求,是治理邻避冲突的重要机制^[6]。

政治学视角也是研究邻避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早在1992年,迈克·迪尔就已提出,规划者应该了解社区居民典型的对立观点之性质、决定因素和社会态度,替代社区提供给他们选择的范围^[7]。而汤汇浩则对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公益项目进行探讨,他详细分析了邻避效应的经济性补偿和社会心理性补偿的关系,根据集体行动理论和邻避效应的特征,提出审慎运用公民参与来实现公益性项目外部效应的内部化。他特别强调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公民参与的制度选择倾向采取法团主义的模式^[8]。

也有学者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问题,通过对心理参数的分析来理解和管理邻避运动,邻避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它是风险社会人类知觉、心理归因交织后产生的复杂现象,并藉此认为其核心特征是不公平。但这种在人类心理看似不公平的现象,实际上潜在地改变了人们的幸福

[1]Graham-Rowe, Not in my back yard! AR app for planning, New Scientist, 2011, 210(2806):23.

[2]RS Burnaman, A Discussion: NIMBYism (Not-in-My-Back-Yard), Florida Bar Journal, 2004.

[3]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广州〕《学术研究》2012年第5期。

[4]Michael J. Walker, Worth the Effort? NIMBY Public Comments offer Little Value Add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629.

[5]李德营:《邻避冲突与中国的环境矛盾》,《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6]赵小燕:《邻避冲突参与动机及其治理:基于三种人性假设的视角》,《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7]Michael Dear,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NIMBY Syndrom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7(11):288-299.

[8]汤汇浩:《邻避效应:公益性项目的补偿机制与公民参与》,〔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7期。

感,通过社区居民的自卫行为促进生活质量问题的解决^[1]。另有文章引入了心理资本理论,不再仅仅关注利益剥夺、环境影响、权利保障等,而是从心理视阈出发,拓展到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影响,并提出以积极的“心理资本管理”代替传统“心理问题防治”^[2]。国外许多学者也更加深入地探求邻避运动中情绪的发生机制,通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的心理反应阶段来描述“邻避”症候群^[3]。

而在解释人类学领域^[4],劳易斯在研究艾滋病对于社区构成的影响因素探讨中,引入了社会空间结构的观念。在他看来,法律对艾滋病本身的规定乃至污名化,成为普通民众看待问题的思维框架,当这种争议因素介入日常生活的时候,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重新理解社区居民的态度转变甚至冲突行为,会更有利于解决邻避问题。

鉴于邻避事件的动员和发展与信息传播有着密切关系,近两年零星可见一些从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如白红义从邻避运动中抗议者与抗议对象的具体镜像在媒体文本上的呈现角度出发,思考媒体的报道策略,认为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三起邻避冲突事件报道中,媒体对抗议者与抗议对象的文本呈现与报道策略中呈现出一种抗争新闻范式,具体表现在新闻框架、消息来源与报道倾向三个方面^[5]。李雅红的《“邻避冲突”网络舆论传播特征研究——以什邡、启东、镇海群体性事件为例》则是研究邻避冲突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清华大学曾繁旭则将邻避运动置于传播学的扩散效应框架之下加以解读,认为中国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出现在不同邻避运动之间,它们在运动剧目、运动框架、组织形式等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6]。亦有论者从邻避冲突中网络舆论的表达形态、传播特点等多个方面探讨邻避运动传播学意义上的特征。这种基础研究,有利于人们以更加开放、严谨的态度对待邻避冲突中的网络舆论,更好地进行监督引导工作,从而促进环境公民社会和环保公共领域的生成^[7]。

2.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相对而言,国外学者较多地运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如1999年,Israel Colón与Brett Marston对抗艾滋病家庭住宅邻避现象的实证检验。他们详细统计了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人口学特征,并且对社区居民对于邻避设施撤留态度的分布进行了统计^[8]。

实证研究的文章虽然鲜见于国内学者讨论中,但以下几篇值得关注。王奎明与钟杨以“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与行为指数”为测评框架,调查按照目的性、可行性、可测性、可比性和经济性原则对中国34个主要城市的居民进行了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提取了影响邻避运动的核心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分门别类^[9]。有些文章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统计,但是在剖析邻避运动成因时,分阶段制作比较形象的示意图,通过将不同阶段事件进展的不同表现连缀在一起,寻找其中的关联与逻辑,并藉此对事件

[1]Castrechini, Bonet,Vida, Psychological parameters to understand and manage the NIMBY effect, European Review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6:43-51.

[2]谭爽:《浅析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及规避》,《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3]Patrick Devine, Wright, Rethinking NIMBYism: The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Explaining Place prot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9(19): 426-441.

[4]Lois. Takahashi, The socio-spatial stigmatization of homelessness and HIV/AIDS: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the NIMBY syndrom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997Vol. 45, No. 6:903-914.

[5]白红义:《环境抗争报道的新闻范式研究——以三起邻避冲突事件为例》,〔北京〕《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

[6]曾繁旭:《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以邻避运动为例》,〔兰州〕《西北师大学报》2015年第3期。

[7]李雅红:《“邻避冲突”网络舆论传播特征研究——以什邡、启东、镇海群体性事件为例》,〔西安〕《今传媒》2014年第5期。

[8]Israel Colón, Brett Marston, Resistance to a Residential AIDS Home: An Empirical Test of NIMB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 37(3) 1999:135-145.

[9]王奎明、钟杨:《“中国式”邻避运动核心议题探析——基于民意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转化过程中的机理进行探究。可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定量研究的启发,将实证思维与定性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从系统脆弱性理论视角分析公共危机事件生成的机理,探索公共危机事件产生的内在逻辑,为公共危机事件治理提供了理论的借鉴^[1]。

3. 法律维度的探讨别开生面

尽管大量文章的关注点在邻避运动本身的产生机理,但也有些研究注重审视邻避运动存在的法理依据,以及运动进行中其民意诉求的法治通道等等。如朱清海与宋涛在环境正义的视角之下,提出只有通过环境正义定量评价实现承认正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实现程序正义,通过利益补偿和社区回馈实现分配正义,才能真正防范和化解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邻避冲突^[2]。郑卫撰文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审视邻避设施建设的程序问题,他认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是邻避设施规划的前提,利益保护是邻避设施规划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环节,程序公正是邻避设施规划的有效保障手段^[3]。他以2008年上海磁悬浮事件中引发的大规模散步行动为例,指出这一规划如果提前置于法律框架之下加以考量,或许后续付出的机会成本会大为削减。杜健勋从法权能力不足与邻避运动治理角度探讨邻避问题。该文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增长,尤其是现代法治话语的兴起,来自邻避设施的环境抗争正在中国规模化增长,这会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与法治结构。基于惯性维稳思维,地方政府一般采用“专断-压制”型的管控模式治理邻避风险,这种模式减损了环境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实践中已呈现出诸多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趋势下,邻避治理必须推动法权结构的合理化^[4]。

4. 独辟蹊径的政府治理思路

邻避问题的生产者与解决者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参与,从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角度而言,政府治理或许是根治邻避问题的最重要的手段与主体。有学者建议将“稳评”嵌入政府决策过程,实现事前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矛盾化解,规范政府治理的主体地位,建立完善的邻避补偿机制,进一步加强风险沟通与公众参与^[5]。邓君韬则指出,晚近内地城市与环境安全紧密相关的PX项目引发之环境事件可从风险认知、决策模式、新媒体作用等方面考量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反向竞价拍卖模型”的引入或许能为政府管理创新、公众参与决策提供实践的契机^[6]。另有文章在谈及同类话题时,将资金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政府要扶持环保民间组织发展,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环保民间组织大力支持,肯定其在邻避运动中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角色,提高环保民间组织的参与深度和广度。”^[7]

另外,针对邻避运动引发的群体事件,有学者指出它是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类群体性事件,不能与近年发生较多的社会泄愤事件混为一谈。对于此种温和的抗争,政府应该也必须以同样温和、积极但不乏理性的态度及时作出回应。这不仅包括对民众具体诉求的回应,还应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潮流对政府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回应^[8]。而马奔、王昕程、卢慧梅通过对邻避冲突案例原因和困境的分析,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公开、问卷调查、民意访谈以及召开听证会等方式来加强社会公众、相关学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把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有多大、环评结果、专家观点、带来的福利等信息及时告知民众,由公众判断设施该不该建设以及如何建设^[9]。

[1]彭小兵、朱沁怡:《邻避效应向环境群体性事件转化的机理研究——以四川什邡事件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2]朱清海、宋涛:《环境正义视角下的邻避冲突与治理机制》,〔武汉〕《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郑卫:《邻避设施规划之困境——上海磁悬浮事件的个案分析》,〔北京〕《城市规划》2011年第2期。

[4]杜健勋:《邻避运动中的法权配置与风险治理研究》,〔长春〕《法制与社会法制》2014年第4期。

[5]王丽等:《政府治理视角下邻避事件的防范与对策研究》,〔石家庄〕《统计与管理》2015年第1期。

[6]邓君韬:《“邻避运动”视野下PX项目事件审视》,〔长沙〕《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7]谭成华、郝宏桂:《邻避运动中我国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北京〕《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8]李永政、王李霞:《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实例分析》,〔北京〕《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

[9]马奔、王昕程、卢慧梅:《当代中国邻避冲突治理的策略选择》,〔济南〕《山东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三、邻避运动研究现存问题之检视

通过对以上对国内外邻避运动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外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丰富,国内学者早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较多,但近年来逐渐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尤其重视“中国式邻避事件”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相较而言,国外学者研究方法较为丰富,如博弈论、利益分析法、定量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多是思辨出发的学理分析,这显示出我国学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尚未脱离理论的引入和介绍阶段,宏观分析视角往往议题过于宽泛、立意过于宏大,而微观研究视角则多着眼于案例本身,缺乏多案例的比较研究,难以建构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要突破这一研究瓶颈,可以通过中观研究视角介入,尝试对宏观与微观视角进行对接。就目前而言,中观研究即我国邻避运动的核心议题的探寻,具体而言即哪些因素主导民众抗争行为的发生、升级或者消退,进而对我国邻避运动的性质进行准确定位。一如 Linnerooth—Bayer 所言,邻避运动不是纯粹的民众私下考量的抗争行为,应该深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以及其他的影响因素^[1]。只有更加全面、深入、多视角地探求邻避问题,才有可能发现被遮掩的蛛丝马迹,保证政策的制定、项目的落地与社会公共安全之间能够达成内在的统一。

在邻避冲突基础理论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深度也有不足,如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类型划分不够周全等,研究路径上基本是单一典型案例的实证考察,缺少综合性研究。而国内研究内容不够深入,表现在一些重复性的理论论述较多,结合案例的深入研究与国外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能抓住我国特有国情对邻避运动的制度弊病、解决路径等进行创新论述的研究极少,研究成果也以散见的论文为主,少见硕博学位论文,基本没有专著。

邻避运动本身作为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民众有组织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在特定的环境下,理性的民众也会在集合效应的驱使下,成为非理性的乌合之众,引发大规模的暴动行为。这本身属于传播学关注的领域,但从这种视角出发的论文目前只有极少数。在新媒体、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今中国社会,信息传播极为快速广泛,其在抗争情绪的唤起、运动号召等方面的巨大力量不容忽视,从传播学视角考察问题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同时,通过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视角的综合研究,从运动生成中找寻信息传播机制,挖掘嵌入社会运动内部的深层动因,如此才能实现用事实、逻辑和推理层层递进,直达问题的核心本质,从而探究出真正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而这是量化方法或者说实证研究无能为力的地方。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兴建,邻避运动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邻避冲突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2013年5月举办的首届“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邻避运动时代,整个社会都应当重视如何应对邻避运动^[2]。对于正处于深入转型期的当下中国社会来说,一些长期积聚的矛盾呈集中爆发态势,如抵制强拆、环境污染抗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亦可以从邻避运动治理的方式、方法中得到有效的参考。邻避运动的学术研究对于解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消弭社会不良情绪,维持社会体系正常、和谐运转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可以预见,邻避运动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如前文所述,未来应在目前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进行新的拓展。

〔责任编辑:平 啸〕

[1] Linnerooth—bayer, Jonne, 《Fair Strategies for Siting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 In Hayden Lesbirel and Daigee Shaw (eds)》,《Managing Conflict in Facility Siting》, Cheltenham, 2005, UK: Edward Elgar, 6—13.

[2] 《首届“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在京召开》, <http://green.sohu.com/20130520/n376483690.shtml>.